

论汉代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的影响

郭海燕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0)

摘要: 汉代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 教育与入仕的结合, 既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也激发了平民积极学习的热情。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使劳动者整体素质得以提升, 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平民受教育者中的少数人晋身仕途, 促使官僚机构成员不断更新, 从而改善了汉代社会的吏治, 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广大平民受教育者还以个人的品德和价值取向影响着地方社会秩序, 淳化着社会风气。

关键词: 汉代; 平民; 文化水平; 教化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5)04-0088-03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5.04.024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crease of Civilians' Literacy Level on Society in the Han Dynasty

GUO Hai-yan

(Sun Tzu Research Institute, Binzhou College,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official-selecting system not only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receive education,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civilians' enthusiasm for active learning. The increase of civilians' literacy level enhanc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workers, and foster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With a few of the well-educated civilians becom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new vitality was injected into the ruling elite, the administration was improved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 was ensured. The moral character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large number of educated civilian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social order and social atmosphere.

Key Words: Han Dynasty; civilian; literacy level; enlightenment

春秋战国时期, 伴随着社会的变革, 在此之前那种学术官守、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步打破, 士阶层崛起, 私学蓬勃发展, “庶人和奴隶, 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情况, 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1], 文化知识开始向民间普及。到了汉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教育与入仕结合, 使得平民读书的愿望更为强烈。各级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也为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而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又对汉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汉代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知识人才的增多, 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从长远来说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这种促进作用我们难以用一个具体的标准或数字去衡量, 但它确实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在汉代, 只有极少数平民在完成蒙学知识的学习后, 有机会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 并因此跻身仕途。大部分人受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 在进行一点蒙学知识的学习后, 便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这部分劳

收稿日期: 2015-05-06

基金项目: 滨州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1Y04)

作者简介: 郭海燕(1978—), 女, 山东淄博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和孙子兵学研究。

动者文化水平可能不算很高,或者仅仅是粗通文墨,但毕竟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在接受前人的生产经验、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及改革技术等方面无疑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容易得多。

就农业生产而言,重农一向是汉代的基本国策,汉政府采取了各种重农措施来鼓励农业的发展,其中一项就是重视农书的编写。《汉书·艺文志》所载农书中,确定为汉代人著作的就有《董安国》12篇、《蔡葵》1篇、《汜胜之》18篇,另外所记《尹都尉》14篇据学者考证也应该是西汉前期的作品^[2],书中有《种瓜》《种蓂》《种芥》《种葵》《种薤》《种葱》诸篇^[3]。另外,杂占类中还有《种树果实相蚕》《昭明子钓种生鱼鳖》等专门性农书。这些农书都是对当时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虽然限于史料,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书籍在民间的流传和应用情况,但是《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赵过行代田法,武帝诏令郡国“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使(汜胜之)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政府大力推广各种农学常识,这些农学著作也应该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具体运用到生活实践中。

平民百姓通过对这些农书的学习,具备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使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进,先进的耕作方法得以实施,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战国时期陶朱公范蠡作《养鱼经》一卷,东汉初年的襄阳人习郁依之凿池养鱼^[4]。这种养鱼法在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中也有反映。缪启愉在《齐民要术校释》卷六的校记中说:“近年在陕西汉中和勉县出土的东汉陂池模型,池中均有鲤鱼和鳖等的造型。四川宜宾汉墓出土的鱼池水田模型也相类似,此类似亦效法范书。”^[5]这种陂池模型在之后的考古中屡有出土^[6]。这些都说明当时这些农书在民间的传播和运用是比较普遍的。

受教育者在改进生产技术方面也较一般平民百姓要容易得多。如东汉姜岐,不仅明经书,而且善于畜蜂豕,并之以教授门徒,从而促进了养蜂业的发展。当然,人们也会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发财致富,如西汉以冶铁致富的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7]。东汉马援年十二而孤,在兄长的支持下受《齐诗》,但意不能守章句,于是去边郡田牧,因为他能够因地制宜,多有良法,“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28]}。

这些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者,也会因自身的知识优势影响周围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下层民众渴望文化的意识,就会使得更多的民众将自己的子女送去书馆读书,这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跻身仕途,也是为了更方便日常生产和生

活。这样在社会中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接受教育的人日益增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二、汉代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在汉代,对于没有家族权势或威望可以依靠的平民而言,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凭借个人的才能、品德、财富、美貌等,但最主要依靠的还是知识。尤其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入仕的重要前提。平民百姓要想进入官方阶层,首先要获得与儒学相关的知识,成为士人,再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仕途。当然,也可以在启蒙知识的学习后,学习律令文书的制作,成为吏员,再经察举入仕或积功升迁。无论哪种途径,都显示选官与教育已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知识在人们通向仕途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根据目前一些学者对汉代官僚机构中成员社会成分的分析,出身平民之家者不在少数。黄留珠先生对两汉孝廉家世可考者进行了统计分类,在能够确定家世的184位被举孝廉中,出身官僚贵族的128人,占69.6%;出身富豪的11人,占6%;出身平民的29人,占15.7%;出身贫民的16人,占8.7%^[9]。邢义田先生专门对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进行了分析:从经济背景上说,贫寒子弟在东汉能成为孝廉的极少,在二百六十五位孝廉的资料里,确实提到家道清贫的只有十八人^[10]。由此可以推测,黄留珠先生所统计的孝廉中平民和贫民应以西汉居多。

在家庭背景可考的两汉县令长中,出身于贫困或单寒之家者的比例与之类似。见表1①。

表1 两汉县令长家庭出身情况 %

	西汉时期	东汉献帝前	东汉献帝时期
官僚之家	68.6	68	44
郡姓、名家		19	32
贫困或单寒之家	23	13	24

由表1可见,东汉前期县令长中出身贫困或单寒之家者较之西汉大为减少,但是东汉献帝时期又有增多的趋势,可能是因为献帝一朝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官僚系统亟需理乱之才,很多有才干的寒门子弟有机会跻身政治舞台的缘故^[11]。另外一组数据也大致反映出与上述类似的发展趋势:《汉书》记载的可以明确士人身份的186名官僚中,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的27人,约占士人官僚的15%;《后汉书》有传的407名

① 本表根据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的统计数据制作。作者考察认为,西汉家庭背景可知的县令长有35人,其中,父祖至二千石以上或贵幸之家子弟24人,占能知道家庭出身人数的68.6%;明确记载为贫困之家子弟的8人,占23%。另有3人,出身状况如何,作者未有说明。

士人官僚中,有 29 人出身贫苦,约占 7%^[12]。

由上面两组统计数据来看,西汉时期平民子弟在政府机构的官员中所占比较大,东汉则有所降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察举制度在成立初期,科目繁多,选拔的范围十分广泛,执行也较为严格。而且,西汉处于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大大小小的统治阶层大都由布衣平民发展而来,世家大族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当时社会在选官方面还不特别注重出身,因此,许多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得以凭借学识和才能入仕参政。随着历史的发展,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察举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东汉前期,尚能“举人贡士,或起畝亩,不系闾閭”^{[8]133}。而到了东汉后期,察举的标准由士人的才能、学识逐渐转变为门第的声望和豪强势力的强大与否。正如仲长统《昌言》所批判的,“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其贤愚,贸易选举”^[13]。豪族大姓凭借家族地位权势,逐渐操纵了乡里舆论,控制了察举、征辟等入仕途径,优先占据了各级官职。另外,伴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州郡的长官在察举时,也多注重扩张自己的实力,率取年少能报恩者,察举制成了豪强权贵网罗党羽培养心腹的手段。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察举制的实施,平民子弟的上升途径逐渐被堵塞,因而在官僚机构中所占比率呈现下降趋势。

不过,从总体来说,在两汉时期,平民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教育是推动平民向上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一定数量的平民凭借学识和才能进入到政府各级机构中,而大批官僚在年老致仕后又返回乡里,不再担任官职。正如南朝裴子野所言:“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14]可以说,“中国在两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社会结构“还不很稳固,而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流动的社会结构就已经是相当稳固定型,几乎可以说是不可回返了”^[15]。

三、汉代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的教化

《荀子·儒效》曰:“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在汉代经学盛行的时期,平民受教育者所学内容主要以儒家典籍为主。他们大多能本着儒家的道德规范来修养自身,将儒家的孝道和仁义礼让之风贯彻在日常生活中,并以高尚的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百姓,从而直接促使着一个地方社会风气的好转,推动着社会的教化。

平民受教育者大多在日常生活中能用儒家的道德准则修养自身,对父母行孝,对兄弟友爱,恪守礼法,严于治家。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从而促使了家庭关系的和睦和良好家风的形成。东汉陈留考城人仇览,于太学受业后回归乡里,不仕,“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8]2481}。仇览用自己的态

度感化妻子,使其有过必改。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8]928}。东汉汝南安城人周燮跟从键为杜抚学习,“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8]1743}《后汉书·周燮传》注引《谢承书》也称:“燮居家清处,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在周燮的影响下,一家人“相待如宾”,礼让有加。

平民受教育者往往因其高尚的品行,对周围的乡里成员产生巨大的人格感召作用,从而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淳化当地的民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东汉南阳孔嵩,曾于太学受业,后“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嵩在阿里,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8]2679};西汉末年的太学生逢萌,不满王莽的统治,隐居不仕,东汉初年,在琅邪劳山隐居,“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8]2760};姜歧“少修孝义,栖迟衡庐,乡里归仁,名宣州里”^[16]。这些人虽然只是个人正身厉行,修身养志,却成为周围百姓学习的典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出现了“服其德化”“服其训化”的景象。

如果说上述人物还只是以自身的品行对周围的人群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有些知识分子则是力矫时弊,有意识地去感化他人,改变乡里的不良风气,促进良好民风的形成。较为典型的事例,如东汉太原王烈在乡里“建学校,敦崇庠序”,其“门人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有异,人皆别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乡境内“宗族称孝,乡党归仁”“大化隆行”^[17]。又如,高凤“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高凤前往劝解,但邻里仍然争斗不休,高凤就“脱巾叩头”说:“仁义逊让,奈何弃之。”在他的劝解下,“争者怀感,投兵谢罪。”^{[8]2780}王烈、高凤等人面对乡里的不良民风或不法之徒,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他人,使民风为之改变。

这些平民受教育者,因其掌握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受到周围百姓的爱戴和信赖,在乡里有着较高的威望,常常成为乡里事务的仲裁者。当乡里发生纠纷或争执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去地方政府请求裁判,而是去当地有威望的民间士人那里寻求解决。这样的事例很多,如上述王烈,“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汝南项人蔡衍,少时明经识礼,“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8]2208};颍川许人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8]2066}。由以上事例可见,在这些民间受教育者的道德感化和调解下,当地乡里出现了“无怨”“退无怨者”“不直者终无敢言”的良好局面,从而减少了社会争端,使得地方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在汉代,平民受教育者中的少数人晋身仕途,促使官僚机构成员不断更新,从而改善了汉(下转第 108 页)

主要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立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劳动法》等及相关配套行政法规,将社会实践经费预算、实习期劳动保障以及大学生创业政策优惠等纳入法制化轨道。二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当与辖区高校有效对接,为“三下乡”、社区服务、社会调研等公益性实践项目提供便利。三是鼓励大学生创业热情。虽然现在国家一直都在大力提倡大学生自主创业,并且各地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些对大学生创业利好的方针和政策,但是在大学生创业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融资难,另一方面是鼓励性政策和支持性资金等在实际落实时遭遇各种阻碍。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落实工作,积极推动大学生创业者在当地生根发芽。

(四)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应当发挥中介纽带作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有形的手”力量毕竟有限,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还必须仰赖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中介纽带作用。特别是基层服务类的实践项目,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以及公益类 NGO 等社会组织应当发挥职能作用,与高校协商共建实践基地,提供相应便利,吸引大学生开展支教、医疗体检、法律咨询等社会服务。金融、教育、餐饮等服务业及制造

业等吸纳实习生容量大的行业协会应当在政策法规框架下,积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大力为所在地区高校开辟专业实习岗位,并在实习生劳动保障、实习期合格评定等方面统一行业标准,保证大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实践。

六、结语

总体而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对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实现以德育人的培养目标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应有作用,是一项需要政府、社会及学校多方联动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社会各方资源。以创新途径模式为基础,以加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大经费投入为保障,着力构建长效机制,是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上接第 90 页)代社会的吏治,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广大乡村地区,他们或以知识教授乡里,进一步扩大文化传播的范围,或成为普通劳动者,推动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并以个人的品德和价值取向影响着地方社会秩序,淳化着社会风气。司马光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18]顾炎武盛赞:“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9]这一局面正是伴随着平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

参考文献:

- [1] 朱启新. 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6.
- [2] 董恺忱,范楚玉.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92.
- [3]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4335-4340.
- [4] 酈道元. 水经注[M]. 谭属春,陈爱平,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1995:426.
- [5] 贾思勰. 齐民要术校释[M]. 缪启愉,校释.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462.
- [6] 许志强. 浅析汉代西南地区陂塘水田模型的分布和传播[J]. 古今农业,2008(2):40-41.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277.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 易畅.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机制[N]. 光明日报, 2014-10-22(10).
- [2] 张希胜. 英美大学与社区互动关系研究与发展的启示[J]. 复旦教育论坛,2007(3):79-82.

(责任编辑:白丽娟)

- [9] 黄留珠. 秦汉仕进制度[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142.
- [10] 邢义田. 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C]//许倬云. 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 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11.
- [11] 邹水杰. 两汉县行政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212.
- [12] 马亮宽. 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J]. 社会科学,1994(2):68-72.
- [13] 严可均. 全后汉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4.
- [14] 杜佑. 通典[M]. 王文锦,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8:389.
- [15] 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39.
- [16] 刘向,皇甫谧. 列女传·高士传[M]. 刘晓东,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1.
- [17]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55.
- [1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07:801.
- [19]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1994:469.

(责任编辑:夏玉玲)